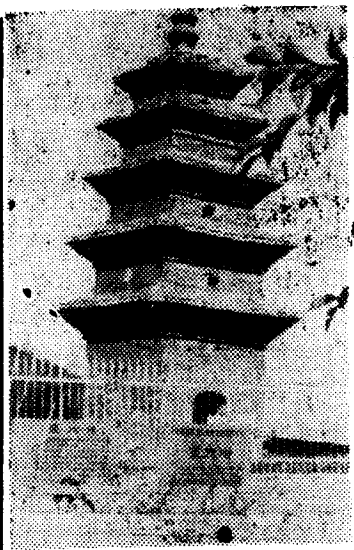


浑江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浑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七月



浑江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吉林省浑江市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编者的话.....

『辽东日报』回顾

敬之同志二三事.....战 科 (1)

对《辽东日报的几点回忆》

.....胡铭祖 (10)

新闻战士第一课

——回忆辽东新闻学校 (第一期) 的女生队

.....王书林 (14)

一段很值得回忆的历史……………周 群 (22)

大潮回忆片段……………胡绍祖 (26)

战略转移 三处出报……………丹 报 (29)

『
四
保
临
江
』
拾
遗

我护送陈云同志去七道江

……………段雨学 (33)

给陈云同志当外围警卫员的日子

……………赵 彤 (36)

“四保临江”前后的辽东新闻台

……………刘桐林 (42)

四保临江战役中的公安工作

……原发仁 蒋会军 王继星 (50)

四保临江期间浑江妇女的支前活动

……尹敬毓 宋丽娟 黄 如 (59)

抗
联
生
活

山河欲裂征马鸣

……………韩 光 (69)

卢 松 岩……………张 宁 (76)

朱京洞惨案……………李权洙 (79)

阎王鼻子战斗……………黄兆喜 (84)

里岔沟突围记……………李永楷 (86)

教 育 史 料	怀念我的父亲宫宪斌……………宫今凯 (91) 难忘的回忆……………雁 群 (95) 受教育于抗日救国者身边 ——忆宫润章老师在伪临江国民高等学校的言行……………宫 健 (98) 缅怀我的老师——宫润章 ……………刘庆余 (102) 对我的恩师宫润章先生的缅怀 ……………赵书孟 (105) 忿然离职……………张万信 (109) 清末至民国时期长白县汉族学校发展概况 ……………赵多样 (111) 旧中国长白朝鲜族教育概况 ……………李权洙 (118) 史公轶事 ——记抚松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史春泰先生 ……………李元东 杨万久 (123)
其 它 史 料 集 萃	友谊花开鸭绿江 ——中朝友谊纪实四则 ……………唐振永 金英姬 薄汉台 (129)

其它史料集萃	一位高山族同胞的回忆 郑碧山 (144) 旧社会临江县境内农村封建剥削的形式和手段..... 张天成 (152) 日伪时期劳工的血泪生活 ——大栗子铁矿劳工的生活 李权洙 (159) 我所知道的“东北朝鲜人民民主联盟” 文圣贤 (165)
日人忆事	《关于在中国临江生活的回顾》一文编者按..... (171) 关于在中国临江生活的回顾 (日本) 坂本金四郎 (172)
补白	临江大同报社..... (21) 张将军与东北义园..... (35) 临江中学大礼堂的由来..... (41) 九岁红认挨一藤杆..... (49) 孙中山禁呼“万岁”..... (58) 愚民政策·奴化教育..... (68) 灵光塔..... (104) 周恩来与李鹏..... (108) 蔡锷入学对联..... (117) 秦始皇“焚书”并未“坑儒”..... (143) 何应钦..... (151) 蒋介石的女婿救护日共领袖..... (200)
后记	 编者

敬之同志二三事

战 科

—

1945年11月创刊的《丹东日报》已有40多年了，历任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也有30多人。在搜集丹东报史资料过程中，同志们回忆最多的，感情最深的，是哪一位领导呢？据我听到的，这要首推刘敬之同志了。有的说他是最先来到丹东的领导成员，有的说他是丹东当社长和总编辑时间最长的领导，至于说他坚持原则性的精神，艰苦奋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以及为了党的事业，从不考虑个人得失的高贵品格，那就更多了。可是每当我提议，清知情的同志写写和敬之同志一起工作的回忆时，同志们却都表示难于下笔，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只是默默的长年如一日的工作着，象一头负重的老黄牛，从不松套。为此，我曾经两次去长春想专访他，也想请他写点回忆文章。可惜，两次见到他，都被婉言谢绝了。至于写文章，他虽然满口答应，但也确实是太忙，至今仍未写成。

这样一位受敬重的老领导，在这样一份报史资料里，一字不提能行吗？在这里，我想先把组稿过程中听到的一些珍贵的史事摘录如下，同时也希望熟悉他的同志，能予补充。

二

1945年10月,刘敬之同志和李干法、刘云沼同志首批由山东《大众日报》社来到安东(即丹东)。地方党委和政府决定接管由地方维持会主办的《辽东民报》,敬之同志是接管这个报社的负责人。陈楚等大批同志到安东后,于11月22日出版《安东日报》时,他任编辑室主任。随陈楚同志去本溪筹办《辽东日报》时,由于形势的变化未成,1946年5月回安东出《辽东日报》,任通讯部长兼新华社辽东分社社长、新闻干部学校的教育长。1946年10月撤离安东时,他配合姜丕之同志带领新闻学校撤退。1947年春在长白、临江、辑安一带坚持前线斗争。在长白、临江,他搞过农村调查,在辑安他办过刻印的电讯快报。1947年8月,二次解放安东出版《安东日报》时,他任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秋,通化的《辽东日报》回安东与《安东日报》合并时,他任副总编辑。48年底陈楚同志率领大批同志赴沈阳加强《东北日报》时,他仍任《安东日报》、《辽东大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抗美援朝中期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社社长。他在辽东负责报纸工作整六年,1951年秋调东北局任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60年底他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政协主席。

三

为了认真宣传党的政策,认真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他对学理论、学政策始终抓得很紧。敬之同志曾说过:我们开始作新闻工作,所受的教育都是围绕

办报要讲党性原则进行的。张闻天同志任辽东省委书记时，组织了一个省直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班，每周学习两次，工作不论怎么忙，他一次也没缺过课。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实践论》时，省委个别同志曾提出不同意发表的意见，认为理论太深，基层干部理解不了。敬之同志根据新华社总社两次指示：要求全国地方党报，一定要全文发表《实践论》的精神，当即决定全文发表，及时地保证了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省委也满意。为了具体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在他主持报纸编辑工作的几年，每天看完样以后，都亲自写一篇社论、评论、编后等文章，常常写到深夜，即使发烧到38℃以上也要坚持写完，不肯间断，直到调离《辽东大众》报为止。《安东日报》和《辽东大众》，尽管领导有过变动，但是编辑出版工作，始终是他负主要责任。他当社长、总编辑的六年中，在宣传党的政策，领会省委意图，体现党性，他始终抓得坚决认真，又快又准。他和历届省委书记——江华、张闻天、张启龙、刘子载，都有密切联系。历届省委领导同志经常找他研究报纸如何宣传党的政策，贯彻省委意图，对他都感到放心、满意。1960年底成立东北局，敬之同志调到东北局宣传部工作，调走时他给同志们讲了一条经验：遇有省委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应按第一书记意见办。对于贯彻“群众办报”的方针，他始终不渝，倾注了全部心血。这次搜集辽东报史资料，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的写材料，赞扬《辽东大众》的通讯工作抓的好。为什么会抓得那么好，又是谁主持抓的呢？经过多方访问，寻根追底，主要的决策者和认真的执行者正是敬之同志。他认真保持和发扬了山东

《大众日报》的优良传统，一到安东办报，就开展工农通讯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他任通讯部长期间，发动全体编辑记者，广泛建立通讯员网，通讯员力量非常雄厚，每位县委书记都是当然的通讯员，有的甚至是特约通讯员；在任《辽东大众》社长兼总编辑期间，他又提出建立县通讯社、各县要配备通讯干事的重要建议。经编委会讨论通过，报请省委批准后，很快就在辽东省各县开花结果，并在通讯干事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新闻干部，不断的充实新闻队伍，不少同志现已成为省、市级的报刊总编辑，出版部门的负责人，甚至省委的宣传部长。

由于通讯工作的基础在那时打的又深又牢，所以直到现在，《丹东日报》仍有三十年以上的老通讯员在发挥骨干作用，本报的农村部仍和三十年前一样，在报上开辟农民通讯员专栏《俺们村里新事多》，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财贸部和通讯员交朋友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可以说：通讯工作根基深，优良传统最感人。

不为名，不为利，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工作作风又严又细，这是敬之同志的突出特点。他编写的稿件，他安排的版面，很少有差错。他的字迹也清秀好认，一丝不苟。撤退在辑安编印电讯快报时，就是自己编、自己刻、自己印，他的字迹受到读者好评。他常说，这不但是个工作作风问题，也是个思想作风问题，一个编辑，在工作时不但要想到千千万万的读者，也要想到那些日夜操劳在拣字架前的工人们，你的一字之差，会使他们浪费多少精力和时间！你们的稿子编得再好，如果字迹不清，有错别字，我就不看！什么时候抄清了，再交给我！他对同志们的要求

也很严格，在这个问题上，象于英、王旭、郭允贤等同志编的稿件质量虽较高，字迹潦草时，他也是不看就退回。他这种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相当一批后来人，在不少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身上，至今仍可见到他的影子。

善于团结各种各样的同志一道工作，是他另一个突出特点。他的作法是，非原则问题让步，或者不加过问，碰到了原则问题，就坚持说服对方，启发同志们的革命自觉性。王旭、李干发等同志，工作很能干，但有的同志反映和他合作较困难。可他俩却最爱和敬之同志相处。王旭同志有个阶段闹思想问题，敬之同志找他谈话，竟谈到下半夜两点钟。帮助同志解决思想问题，他总是循循善诱，从不斥责同志。“革命完全靠自觉”、“一个人有思想问题，总是会有明白过来的一天”，他常这样说，也坚持这样作。工作出了什么问题时，他从不推给别人，总是自己首先承担责任。姜丕之同志也说和敬之同志一道工作，回想起来总是很愉快的。

在个人生活问题上，他也是谦虚谨慎，克己奉公。四十年代末供给制时，吃发霉的大米和烂酸菜，使他的神经性肠炎又犯了。他瘦得很厉害，组织上照顾他给弄了一袋白面，他把面送人，自己仍坚持吃普通灶。他常说，什么饭都可以吃，什么衣都可以穿，什么困难也都可以克服。一九三九年，在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时，一次被日寇包围，他的左耳后被日军的三棱刺锥刺穿，倒在道边的沟里。扫荡过后，报社的同志打扫战场，从沟里把他抬到老乡家，由于当时的条件艰苦，无法治疗，是自然愈合的，

一直到1946年，还经常渗出浓血，后经市里医院一位日本大夫重新作了手术。从此之后，虽然不再流血水了，但却因此常常引起高烧。这件事他自己不讲，许多同志也都不知道。是十年内乱时，有人从反面给泄密了。根据他曾经留学日本，便说他乘日军扫荡之机，装死躺下，要给日本当特务。诬陷经不起调查和证实，经过反复调查，北京的两位同志证实了受伤的真实情况，从此这个秘密才公开了，原来他还是个二等甲级残废。还有一件事，1952年的一天，敬之同志的母亲和他的三弟来报社看他，走的时候敬之同志的母亲乘坐马车，而他的三弟却在后面跟着走，这虽是一件小事，可却在报社同志们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个同志在日记中写到“该走的就走”，为什么车上有座位，不让他弟弟上去坐呢？这也是革命纪律，该坐的就坐，不该坐的就走，特别是领导干部家属，更应严格要求。

四

近几年，记者公出去北京，见到在新华总社工作的几位原人大新闻系的同学，他们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敬之还作过排版工作吗？我感到意外，答不上来，只好反问：怎么会想到这么个问题？他们告诉我，在总社的一次讨论出版工作的会议上，就改进出版工作问题，敬之不仅提出了改进的意见，而且提得十分内行，连什么样的版、该用几倍、几分的条、多少号字等，都讲得准准成成。新华总社的副社长，对排版技术怎么会这么精通？听到他发言的同志都感到惊奇。他真的作过排版工作吗？直到1978年5月，记者终于得到了生动的答案。

1978年5月的一天，为搜集丹东报史资料，《丹东日报》编辑部邀请印刷厂的一些老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到会的都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报社印刷厂的工人、班长和厂长，是报社印刷厂的一些元老。座谈中同志们讲得最喜欢的就是讲敬之。说他从他当编辑室主任起，每天发完稿以后，都要到印刷厂看看。即使抗美援朝初期，印刷厂搬到市郊九连城，距离编辑部十多里路，他也是发完稿以后，坐上吉普车到印刷厂去一趟。除非有重要会议，从不间断；由于高烧、病重，实在去不了啦，也不过只有几次。报纸不出版，他就心不安，天天要看出版的第一张报，已成为他的习惯。

他到车间都作什么呢？着重研究怎么排版好看，怎样印刷清楚，怎样避免差错，怎样解决出版过程中天天都避免不了的种种具体问题。

“老社长，这篇稿装不下啦，你看……”

“好，把镊子给我。”敬之接过镊子，就在字盘上一个一个铅字地删起稿来。删完装好，还要问一下：

“孙师傅（孙启玉），这么样行不行？”

“啊！好、好、好！”

不光是动镊子删稿，他也常动手拣字，换标题字，有时还串版，换条，加个小报头。双手沾有铅污，对他来说那是家常便饭。讲排版，如此天天不断，五年六年的时间怎能不熟呢？

隆隆的轮转机开始印报了，他又来到轮转机旁抢先看样。在这个环节，也是常有漏洞需要他来拿主意。有一次，校对同志与他来看当天的第一张报，发现一篇电讯稿

的文内，把“周恩来”的“来”字拣成“求”字。

“社长，不好，政治错误。”多少双眼睛看着敬之同志。他不慌不忙，略想了一下便对王云阁说：

“老王，看你的啦，用小刀把求字凿成来字行不行？”

王云阁说：“是个办法，试试看。”王师傅精心巧作，还真的改制成功了。

还有一次，印报看样时发现标题把“周总理”错成“周经理”。这可没有办法了，敬之当即决定重新制版印刷。

有时，等电稿时间太长，排版工人坐着坐着就困了，敬之同志也常来到车间看望。

“怎么，都打瞌睡啦？”他笑问工人。

“社长，你唱个歌听听吧，听歌，俺就不困啦。”工人们都站起来热烈地欢迎他唱。

“好！我听大伙的；唱的不好，大家别见笑。”于是：

“人家姑娘有花戴，

我爹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红头绳，

……”

同志们每次欢迎他唱歌，他老是唱白毛女插曲，而且每次都唱不到结尾。但是同志们却都愿意听，一听，就困神顿飞，满屋欢笑。

就是这次座谈会上，到会的同志们议论，敬之在丹东的六年，真是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安东日报》和《辽东大众》。同志们一致提出一项诚恳的希望，就是请陈楚、

敬之等老社长、老总编辑，再来丹东一次，让大家伙再看他们一次，留下一张合影照片，就别无他求了。

陈云同志在临江旧居简介

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于9月16日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来东北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向南满解放区大举进犯，南满根据地仅剩临江（今浑江市）、长白、抚松、靖宇四县，局势非常严重。辽东分局、辽东军区、辽宁、安东两省委和政府机关、工厂、医院、学校转移到临江。正在我处境艰险去留倏关之际，党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派陈云同志来南满，兼任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书记，他于10月27日从哈尔滨出发，途经牡丹江、图们、朝鲜等地，11月12日辗转到达临江。

陈云同志来到临江后，即住在“南围子”。他在临江工作期间，曾在“七道江会议”上，制定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战略方针，指挥了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久，又发动了强大的夏季攻势，收复了南满广大地区，迫使国民党军由战略进犯转入战略防御，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迅速改变东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

陈云同志在此居住期间，领导了辽东土地改革运动，对辽东党、政、军的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陈云同志于1947年6月离开了临江。

（史办辑）

对《辽东日报》的几点回忆

胡 绍 祖

一九四六年八、九月份，我任辽东日报社（当时在通化）社长。同年十一月底，报社随辽东省委撤离通化到临江大湖，十二月在临江成立辽东分局，约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份，《辽东日报》的同志经朝鲜撤到临江，分局决定《辽东日报》与《辽宁日报》合并，称《辽东日报》，属分局机关报。陈楚同志任社长，我任副社长，我着重抓报社党的工作。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军夏季攻势收复了通化，报社也随分局由临江迁回通化。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分局撤销，《辽东日报》也随之撤销，报社同志随陈楚同志回到安东，办《安东日报》，陈楚任社长，我任副社长。一九四八年末，沈阳解放后，我离开新闻战线，经东北局分配到东北大学。

回忆这一段历史，许多细节感到恍惚，实难写成回忆文章，只好写点大体的印象。在这期间，最关重要的是四保临江。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战争，也是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这场决定辽东命运的斗争，终于以我军取得胜利、敌人惨遭失败而结束。从此，我们便转入战略进攻，整个南满根据地也便迅速得到开拓和建设。在这期间，报纸工作在分局和省委领导下，尽管工作条件十分困难和艰苦，但同志们革命意志旺盛，大家紧密

团结，勇于克服困难，发扬了优良的革命传统，报纸也发挥了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的主要作用。在这三年多的工作中，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一、党委领导十分重视党报工作，党报工作人员坚决接受党的领导观念也很强。一九四七年一月份，辽东分局决定《辽宁日报》与《辽东日报》合并时，是分局宣传部长刘芝明同志亲自到报社传达分局决定的，并组织合并事宜，讲清当时形势和办报方针、任务。两报同志一致拥护，迅速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调配各方面人员，立即开展工作。大家都感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能接受党交给的任务，是最荣幸的事情。对于工作岗位和生活待遇等从不计较。虽然是两个报社合并，却没有发生任何扯皮的现象，合并之后，大家就一心忙于开展工作。

报社随分局迁到通化以后，解放战争形势日趋好转，分局主要精力抓土地改革，建设根据地。分局的领导始终关心报纸工作，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常找报社负责人到他的办公室去谈问题，指示我们写社论；有时我们写了社论送陈云同志审阅，他亲自给我们修改。陈云同志也亲自动手写社论，交我们发表时还让我们给斟酌。陈云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对我们教育鼓舞极大。

在《安东日报》时，当时省委书记江华同志，也常找报社领导同志去谈情况，作指示。党委领导同志亲自过问和指导报纸工作，这是我们党的好传统，对党报坚持党性原则，发挥党报应有的战斗作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在党的领导下，大家紧密团结，同心同德，不搞小圈子，不搞山头，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当时

报社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大目标一致，很容易团结合作。在通化时，有延安来的干部，也有苏中来的干部，还有通化当地的干部，有作过报纸工作的，也有刚作报纸工作的。大家虽然不熟悉，却都能从工作出发，互相配合，不讲价钱，很少有闹矛盾的。撤到临江大潮，条件更为艰苦，用手摇发电机收发电讯，大家争着上阵，让记者去敌后采访，也没有人讲过价钱，都是服从分配，忘我工作。那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状态，至今想来仍是记忆犹新，值得永远怀念和发扬。

两个报社合并以后，摊子大了，人员多了，尤其是《辽东日报》来的，干部力量较强，富有办报经验。可是分配任务时，很少有闲言碎语的，也很难听到有讲价钱的。都是从工作出发，自觉服从分配。特别是陈楚同志，很能团结同志，很有工作经验，领导班子之间，真正做到了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通情报。有问题也能诚恳提出意见，互相交谈。大家相处，没有你一伙我一帮的，有矛盾时，也能从工作出发，通过交谈去解决，谁也不存戒心，心情都很舒畅。因此，生活虽然很苦，但是精神都很愉快。

三、报社机关党的工作很重要。当时的报社都很重视党的工作。《辽宁日报》时，是延安来的副总编辑陈绪宗同志兼任支部书记，《辽东日报》和《安东日报》时，都是我兼任总支书记。那时，不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反攻时，干群中总是有不少思想问题，需要党作工作。总的讲，当时党员组织观念比较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也比较好。当时的大多数党员都是《辽东日报》来的，我是